

混沌世界中伦理认知的“变革”：

解读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

The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Cognition in a Chaotic World: An Analysis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Rashomon”

霍 斐 (Huo Fei)

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经典短篇《罗生门》由明暗两条对峙伦理线——“白昼”的秩序内伦理与“黑夜”的秩序外伦理——并行展开叙事。在小说中，平安时代下等武士“家将”面临饿死或做强盗的两难选择，因受武士伦理身份和性格缺陷的束缚，而没有勇气做出抉择。在罗生门上的混沌世界里，“家将”与拔死人头发的他者“老太婆”相遇，由此展开不同伦理观的对决：家将认为拔死人头发是不可饶恕的“恶”；老太婆认为为了“活命”可不择手段。最终，家将选择扒掉老太婆的衣服，走向“恶”。这种“恶”旨在从秩序外部破坏旧秩序，以重构新秩序，实现伦理认知变革，从而获得新生。

关键词：《罗生门》；芥川龙之介；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伦理认知；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霍斐，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代文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人建构的‘鲁迅像’研究”【项目批号：23YJC75200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Cognition in a Chaotic World: An Analysis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Rashomon”

Abstract: The world-renowned short story “Rashomon” unfolds its narrative along two contrasting ethical lines: the “daylight” within the order and the “night” beyond the order. Set in the fictional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Heian era, a low-ranking samurai retainer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starving to death” or “becoming a robber.” To be specific, his hesit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was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a samurai and his sentimental personality. At this time, on the Rashomon gate in a chaotic world, the retainer encountered an old woman plucking hair from dead bodies. This sparked off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retainer

believing plucking hair from the dead an unforgivable “evil,” while the old woman argued that survival justified any means. Inspired by this, the retainer committed the violent act of stripping the old woman of her clothes, officially descending into “evil.” However, this “evil” disrupted the old order from the outside and reconstructed a new ethical framework, thereby achieving a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cognition, and thus a new life.

Keywords: “Rashomon”;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gni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Huo F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huofei728@163.com).

《罗生门》（『羅生門』，1915）是芥川龙之介（Ryunosuke Akutagawa，下简称“芥川”）早期创作的经典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初，小说未受到日本学界较多关注，毋宁说几乎被“完全漠视，仅有只言片语的私下评论”（三好行雄 64）¹。然而，作者芥川始终自信地认为：“在自己所有作品中，这部小说完成度最高”（『芥川龙之介资料集 2』511）。特别是小说开头“某日黄昏，有一家将，茫然地来到罗生门下等着雨停”（《罗生门》7）²，一语奠定了小说的时空构造——时间是“白昼”（秩序内）向“黑夜”（秩序外）转换的“黄昏”时刻；空间是雨夜的罗生门。在《罗生门》之后，芥川又创作一系列以“黄昏”为开头的作品，如《桔子》（『蜜柑』，1919）和《杜子春》（『杜子春』，1920）等，由此被日本学界称为“黄昏作家”³，并登上日本文学“新思潮派”的首席宝座。该流派的创作主旨是“洞察和突显社会的黑暗面与人的原风景”（秋山虔 169），而《罗生门》恰恰是贯彻这一创作理念的代表作。

《罗生门》讲述了日本平安时代一位下等武士“家将”，在面对“饿死”或“做强盗”的选择时，因受武士伦理身份和性格缺陷的束缚，没有勇气做出抉择而陷入两难的故事。对此，吉田精一（Seiichi Yosida）从伦理视角出发，指出“芥川在正义感和利己主义的双重心理驱使下，塑造了一个无法彻底行善或做恶的、变化不定的人物形象”（318）。驹尺喜美（Kimi Komashaku）反驳道：作者在此建构的“并非是无法贯彻行善或做恶的、变化不定的人物形象，而是善恶并存的、处于矛盾体的人类本身（……）作者是站在认知者的视角，洞察矛盾同时并存的人自身”（30-31）。三好行雄（Yukio Miyoshi）则直指问题核心，强调说：作者虽用“勇气”一词表现家将犹豫不决的行为，但真正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本文有关《罗生门》的引文均来自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东京：新潮社，1918年）。引文均出自笔者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3 参见平岡敏夫：『芥川龍之介抒情の美学』，東京：大修館書店，1982年，第203页。

使其举棋不定的根源是作为人的最后伦理或超伦理。作者的叙事动机是如何使读者跳出既有认知世界，而非徘徊于感性诉诸。¹不难看出，吉田精一和驹尺喜美仅聚焦问题表象，而三好行雄则直指作者叙事动机，揭示出主体如何“变革”既有认知世界。上述见解，无疑对深化《罗生门》的理解很有启发，而本文旨在探讨在直面超出秩序法则的超伦理语境下，作为下等武士的家将与普通百姓老太婆相遇后，二者如何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冲破伦理身份的禁忌领域获得新生，以期为现代人直面伦理困境时“变革”自身伦理认知，做出理性选择提供启示。

一、秩序内的伦理困境：是“饿死”还是“做强盗”

《罗生门》中的京都城连年发生地震、台风、火灾和疫情等灾害，路旁和土墙下随处可见死者尸体，这些无人问津的尸体，被随意扔到罗生门上供乌鸦啄食。在此情形下，有一家将被主人辞退，来到罗生门下等着雨停。其实，即使雨停家将也无去处。对家将而言，想要活下去就得解决生计问题，可直面饥荒的现实，横在其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饿死”或者“做强盗”。家将预感到未来命运，只能选择后者，可又没有“勇气”，始终徘徊于“要么……”的反复中。由此，家将陷入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三好行雄指出：“正如独白 To be or not to be（……），有人将其译为：是做，还是不做，这才是问题。的确，龙之介的家将酷似‘落魄的哈姆雷特’。在认知上，他明知自己必须做什么，可站在罗生门一隅的家将，却被某种伦理封闭了他的行为（……）龙之介想带读者走出的是认知与思考法则的场所”（61-62）。此处，“封闭”住家将去“做强盗”的“某种伦理”显然是世俗的伦理道德，但从家将的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来看，束缚其“做强盗”的原因还包括身为武士所拥有的伦理观。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聂珍钊 263）。尽管家将是下等武士，但仍有责任和义务恪守“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七种价值观。²其中，所谓“勇”是指作为武士即使直面困难和威胁也能保持坚强和勇敢。三好行雄认为，“作者在此使用‘勇气’一词（……）是指作为人的最后伦理，也即超越性的道德准则”（62）。“作为人的最后伦理”是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质，即人所具有的伦理意识³。但这里显然忽略了家将的伦理身份，准确地说，家将的武士身份才是束缚他鼓起“勇气”去做强盗的禁忌根源。正因为如上伦理意识的存在，家将暂时未选择做强盗，处于做“人”与做“兽”的临界点上。

1 参见三好行雄：『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62页。

2 参见新渡戸稲造：『武士道』，東京：岩波書店，1938年，第58页。

3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为此，叙事者以“作者”的身份登场，从动物蟋蟀的处境出发，将家将的生存境遇视觉化：“雨中”的罗生门下，家将看见朱漆柱子上栖息着一只孤零零的蟋蟀，可京城寒风呼啸，已冷到需要火炉的季节，蟋蟀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雨声”好似仅仅是无限地延长时间，其实虚构的风景与家将的心境恰好重叠。海老井英次（Eiji Ebii）指出，“相对于罗生门上的尸体，徘徊于‘饿死’或‘做强盗’的家将之形象，暗示着生命本身。或者说，感慨人生无常的存在基调，显然是通过‘蟋蟀’的表象表现出来。即此处的‘蟋蟀’象征着被‘雨’无化和归于‘死亡’宿命，且与家将的感伤性格产生共鸣”（144）。在罗生门这一充满“无常”的场所，蟋蟀的印象像一面镜子将家将的生存境遇视觉化，那么蟋蟀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罗生门上的时间设定。家将来到罗生门的时间是“黄昏”时分，成群的乌鸦像麻子似的盘旋于罗生门上空，争相啄食死人肉。在此，罗生门上“黄昏”的时间设定，将日常世界的生存空间一分为二：一方是代表秩序社会的白昼；另一方是象征混沌世界的黑夜。加之正下着大雨，罗生门就在黑夜和大雨的笼罩下，形成一个异空间的混沌世界。蟋蟀在异空间消失，无疑预示家将的未来命运。海老井英次认为，根据“作品情结的展开，‘蟋蟀’消失后登场的是老太婆。作为生命体的存在，二者虽具共通性，但如果说‘蟋蟀’意味着＜自然性＞，老太婆则象征着＜自由性＞，由此形成对应关系。在归于‘无’与‘死亡’的世界中，家将从沉迷于感伤中的‘蟋蟀’的生存状态，转向洋溢着意志和生命力的老太婆，无疑是‘罗生门’的主调”（144）。此观点洞悉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家将形象与蟋蟀意象之间的投影关系。这与芥川对家将形象的刻画动机基本一致。芥川曾坦言：《罗生门》中探讨的是“伦理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至少是像无教养式的凡夫俗子，其所持的伦理观，往往是随着情绪和感情变化而变化的产物，常常被当时所处的状况所左右”（『芥川龙之介资料集2』 546）。但正是其年轻而未定的伦理观，为他此后的认知“变革”奠定了基础。二是蟋蟀消失后，代之登场的老太婆与家将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又是什么呢？

二、秩序外的伦理混沌：异空间的认知冲突

处于伦理困境的家将打算到罗生门楼上休息一晚，再解决生计问题，于是缩着身体登上通往楼上的梯子。走到梯子的中段时，他发现楼上有微弱的“火光”，再往上走，便看到有火把在不停地移动。他像“壁虎”似的爬到楼梯口朝里望去，映入眼帘的却是死人堆里蹲着一个白发老太婆，像母猴给小猴子抓虱子一样，一根根得拔着死人长发。

对于此处的“梯子”，可做如下理解：首先，当主体“从某种生存状态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时，‘台阶和梯子’是实现这种可能的、连接两个断层世界的媒介”（平岡敏夫 23）。家将从楼下位移到楼上时，“梯子”成为连

接秩序的日常生活世界与混沌的非日常世界的“媒介”。其次，叙事者的叙事视角从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蟋蟀，转向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猫、壁虎和蜘蛛。这暗示着家将登上楼梯后，其伦理身份和认知意识将发生质的飞跃——不再是感伤蟋蟀命运的无常，而是由被动的弱者转向主动的强者。此时，映入家将眼帘的浑浊“火光”，正象征着家将无意识世界燃起的微茫的希望。

家将借助“火光”，看见老太婆正在拔死人头发的，顿时在内心涌出一股难以言表的憎恶感。此时，家将还无法判断对方行为的“善”与“恶”，但有人“在雨夜的罗生门上拔死人的头发，仅此足已是不可饶恕的恶”（14）。此时，如果有人再问其徘徊于楼下思考的难题：选择“饿死”还是去“做强盗”，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的内心转变，无疑是“作用于家将内心的、超越‘合理判断善恶’的直感，以越过法则的超伦理构造，感受到老太婆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恶’”（三好行雄 60）。但从小说文脉来看，家将的“憎恶感”还源于其武士身份“义”和“仁”的伦理观，即因对死者仁爱而产生怜悯之情，进而从内心涌出正义感。可见，此时的家将还未完成身份转换。想要获得根本性认知“变革”，就必须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家将与老太婆之间的身体对决和言语对话，才是其实现认知“革新”的决定性契机。

家将快速登上楼梯出现在老太婆面前，老太婆在尸体堆里站起来几次企图逃走，却都被家将挡住去路。此时，家将才发现老太婆瘦得皮包骨头，他问道：“在干什么？快说！”（15）可老太婆却像哑巴似的沉默不语。他突然意识到对方的生死，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内心悠然升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满足感”。此时，“对于家将而言，老太婆是唯一的‘他者’，扮演着与他对立、并将其带入负时空的梅菲斯特式之角色”（三好行雄 60）。可见，家将和老太婆是“对立”的“他者”关系。从二者身体状况看，家将身体健壮，腰配刀剑；老太婆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家将从老太婆身上获得的“满足感”，显然就是“强者”征服“弱者”的满足感，与老太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中所犯的强者欺辱弱者的“恶”相通。这种“恶”的实质是，作为个体完全被社会体制同化，不怀疑自己所为是不道德的，不加思考地扮演着将对方“他者化”的角色，践行着被社会体制所同化的“恶”。同时，从伦理身份而言，作为下等武士的家将，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为是被社会体制同化的“恶”，声称“我不是警察机关的差役”（16），只要你说出“为何拔死人的头发”（16）即可，实质上却正以“审判官”的身份，品尝着弱肉强食的“成就感”。

老太婆睁大像食肉鸟似的眼睛，盯着家将的脸，从喉咙里发出像乌鸦或青蛙的声音说：“拔这头发，是为了做假发”（16）。对此，家将不仅感到失望，甚至觉得受到侮辱。平冈敏夫（Toshio Hiraoka）认为，“使家将产生‘失望’甚至有种‘侮辱感’的原因，源于其期待”（42）。那么，家将内心到底“期待”着什么？生活在秩序内部的家将，突然闯入与动物乌鸦和猴子等属于同类的、生存于秩序外部的老太婆之场所，即使听了对方的解释，也会站在自

己的立场判断对方行为的“善恶”。¹老太婆的“生之场所”等同食物链上的乌鸦和猴子，与家将的生存境遇（如猫、壁虎、蜘蛛）形成对峙。家将企图在社会秩序的伦理内部找到其成为强盗的合理根据，而老太婆秉持的生存伦理却存在于社会秩序外部。从叙事者视角来看，老太婆拔死人的头发，就像猴子妈妈给小猴子抓虱子，是“善”的表现，可对家将而言这种行为却是“不可饶恕的‘恶’”（14）。这是二者在罗生门的混沌世界发生认知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家将的认知意识与康德伦理学“无论何事，追求例外情形下‘自我’行为的合理化就是‘恶’”等同²，而老太婆的认知意识与黑格尔的“家族的立场、家族的情爱立场”相似³。前者属于康德伦理学的思考范畴，认为从“自我”的利益出发，希望他人能够特殊地对待自己，这种行为显然潜在着非理性的倾向，而在非理性之处就会产生“恶”。对此，黑格尔伦理学从家族、社会、国家和世界史等整体问题出发，提出在道德生活中存在两种法则：一是“人的法则”，诸如国家的法律和法令；二是“神的法则”，譬如站在家族的立场、家族情爱立场的行为。作者借用“梯子”这一媒介，让家将从“白昼”走向“黑夜”，其目的就在于：一、通过空间上的位移，使家将挣脱身份束缚，获得行动自由；二、使家将通过伦理认知“变革”开辟新的生存伦理。

三、旧伦理的终结与超伦理建构

面对家将的追问，老太婆无奈地回答：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恶，但这里的死人在活着时都干过诸如此类的事，且谁也不认为那是恶。现在被“我”拔头发的死者，在活着时曾把蛇切成一段一段晒干，当作鱼去卖，但“我”不认为这是恶，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饿死，没办法”（18）。不难发现，老太婆秉持的是“没办法”的生存伦理，与家将直面的伦理困境：要么“饿死”，要么“做强盗”暗合。于是，家将一边冷漠地听着老太婆的话，一边在内心萌生某种“勇气”，且敢肯定这种“勇气”就是自己在罗生门下所缺乏的那种“勇气”，并与刚才在楼上征服老太婆时涌起的那股“勇气”，是完全反方向的冲动。三好行雄认为，“老太婆的伦理认知，并不能教给家将任何东西，因为同样的伦理，在家将的认知内部早已孕育而生。他需要的是如何获得新的认知，才能饶恕‘不可饶恕的恶’，因此，家将与老太婆的相遇，是认知与认知的邂逅”（63）。然而，老太婆的伦理认知果真不能“教给家将任何东西”吗？事实代明，听完老太婆的回答后，家将获得了“勇气”，且做出了行动。

作为主体的家将对“他者”老太婆的伦理认知，产生共振乃至共鸣。老太婆教给家将的生存伦理是：要想活下去，就得终结至今束缚自己的旧伦理，从认知观念上超越既有的善恶之分、仁义道德，在既有秩序的外部建构超越世俗

1 参见田中实：「『羅生門』の＜読み＞の革命——＜近代小説＞の真髓を求めて」，《日本文学》，东京：日本教育协会，2018年，第5页。

2 参见金子武藏：『ヘーゲルの精神現象学』，东京：筑摩书房，2012年，第27页。

3 参见金子武藏：『ヘーゲルの精神現象学』，东京：筑摩书房，2012年，第30-31页。

伦理的认知理念，即超伦理。正是在这种伦理“变革”的启示下，家将顺势揪住老太婆的衣领说道：“那么，我扒掉你的衣服，你也不会憎恨吧？因为我也是没有办法，不然就会饿死”（19-20）。说完便快速扒下老太婆的衣服，将其夹在腋下，通过陡峭的楼梯，瞬间消失在黑洞洞的夜幕，谁也不知其去向。对此，关口安义（Yasuyoshi Sekiguchi）指出，家将的行为是对老太婆的“惩罚”，其教诲功能是“劝善惩恶”（56），而田中实（Minoru Tanaka）认为，“家将成为强盗，只不过是其根据‘自己化’的世界认知，安逸地抢走老太婆的衣服，但此行为并不能获得自救”（7）。换言之，家将与老太婆的相遇，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与“他者”的相遇。

实际上，家将毅然地“扒掉老太婆衣服”的“勇气”，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表现为“恶”，此处的“恶”是从秩序外部破坏和颠覆旧秩序的能源所在；二是让老太婆认识到什么是“耻辱”，因为只有“知耻”才能“向善”。二者合力，才能终结陈腐而世俗的旧伦理。家将获得的另一种“勇气”，也就是与“憎恶和侮辱感”相反的“勇气”，则是家将超越“强盗”之路，在秩序外建构超伦理的可能性。对此，三好行雄指出，“家将可能和老太婆一样，以‘为了活命，没办法’为理由，与对方黯然地达成互相宽恕的状态。小说结尾‘谁也不知家将的去向’，真正把家将放逐到了‘无明’的彼岸”（71），而田中实认为，“家将不只限于成为强盗，因为他仍然停留于感伤而消极的年轻人之思维，故不会成为其它任何确定的人物。即家将要想成为强盗或其它人物，则需要与旧的伦理认知进行对决，与‘他者’展开对决，真正与外部相遇，这才是作者旨在叙述的领域。即作者经过再三修稿，最终抵达‘谁也不知家将的去向’，表明其陷入认知的‘无明暗夜’”（7）。但从小说结尾的两次改稿不难发现，在初稿（1915）和二稿（1917）中，作者明确让家将做“强盗”，直到终稿（1918）才将结尾改为：“谁也不知家将的去向”（20）。其意图就是让《罗生门》从家将成为“强盗”的故事，转变为家将终结旧伦理、在秩序外部建构超伦理的故事。从初稿到终稿期间，芥川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罗生门》的变奏曲，作者还发表了《偷盗》（『偷盗』，1917），在“黑洞洞的夜幕”（20）世界之延长线上，进一步探讨丑恶的现实。芥川在《罗生门》的结尾处写道：“爬在楼梯口的、头发倒立的老太婆，朝着黑洞洞的夜幕望去，但其背后的火光仍然在燃烧”（20）。即使是老太婆这样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存在，仍有获得自救的希望，但此处蕴含的微茫“希望”不再是弱肉强食的伦理观，而是克服“利己主义”、开辟超越“自我”的世界观。

芥川在《罗生门》中建构的伦理观，不仅具现了作者人生观一隅中隐秘于灵魂世界的“伦理”问题，而且展现了其伦理认知的变革轨迹，即从康德伦理学转向黑格尔伦理学。叙事者首先叙述了家将因受到双重的伦理法则——秩序内“白昼”世界的伦理法则和作为下等武士的伦理身份——的束缚，直

面要么“饿死”，要么去“做强盗”的伦理困境，且明知其未来的命运只能选择后者，却又找不到合乎其道德规范和身份的伦理依据，由此陷入没有“勇气”做出选择的生存困境。对此，作者让家将通过“梯子”，从日常世界的楼下登上混沌世界的楼上。同时，为了暗示家将通过空间上的位移，将会挣脱既有的伦理身份武士道精神的束缚，从感伤于蟋蟀的未来命运“无”或“死亡”，转向主体“自我”能够能动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叙事者有意图地将叙事视角，从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蟋蟀，投向身处食物链顶端的猫、壁虎和蜘蛛等，由此象征家将的认知世界将会发生质的“变革”。也就是说，作者在《罗生门》初稿和第二稿的结尾，让家将去“做强盗”时的认知意识，仍停留于康德伦理学，但前后经过三年沉淀后，作者让家将消失于“黑洞洞的夜幕，谁也不知其去向”，由此转向“黑夜”的秩序外世界，使家将的认知世界发生质的飞跃：从只考虑个人的或“自我”的利益，强调例外情形下“自我”言行的合理化，转向从整体出发，兼顾“人的法则”和“神的法则”的黑格尔伦理学，从而获得新生。即家将在混沌世界的罗生门上，终结了伪善的、“自我”行为正当化的旧伦理，开辟了在现实世界的秩序外部建构的伦理认知的新视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变革。与此同时，老太婆在被“扒掉衣服”之后，也获得了对固有认知痛定思痛的反思契机。作者投影在老太婆背后燃烧的“火光”，暗示着在她内心燃起的走向“新生”的希望。《罗生门》采用明暗两条伦理线交叉的叙事手法，刻画了主体“自我”追求“个体人生意义”的过程，由此树起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Works Cited

- 芥川龍之介：『羅生門』。東京：新潮社，1972年。
- [Akutagawa, Ryunosuke. *Rashomon*. Tokyo: Shinchosha, 1972.]
- ：『芥川龍之介資料集 2』。甲府：山梨県立文学館，1993年。
- [—, *Ryunosuke Akutagawa Archives 2*. Kofu: Yamanashi Prefectural Museum of Literature, 1993.]
- 秋山虔、三好行雄編：『新日本文学史』。東京：文英堂，2016年。
- [Akiyama, Ken and Yukio Miyoshi, eds. *A New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okyo: Buneido, 2016.]
- 海老井英次：「『羅生門』——＜自我＞覚醒のドラマ」，『芥川龍之介『羅生門』作品論集』，志村有弘編。東京：クレス出版，2000年。
- [Ebii, Eiji. “‘Rashomon’: A Drama of Self-Awakening.” *Collected Essays on Ryunosuke Akutagawa’s “Rashōmon”*, edited by Arihiro Shimura. Tokyo: Crest Publishing, 2000.]
- 平岡敏夫：『芥川龍之介と現代』。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年。
- [Hiraoka, Toshio. *Ryunosuke Akutagawa and the Modern Era*. Tokyo: Taishukanshoten, 1995.]
- ：『芥川龍之介抒情の美学』。東京：大修館書店，1982年。
- [—, *The Aesthetics of Lyricism in Ryunosuke Akutagawa*. Tokyo: Taishukanshoten, 1982.]
- 駒尺喜美：『芥川龍之介の世界』。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2年。

[Komashaku, Kimi. *The World of Ryunosuke Akutagawa*. Tokyo: Hosei UP, 1972.]

三好行雄：『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

[Miyoshi, Yukio. *On Ryunosuke Akutagawa*. Tokyo: Chikumashobo, 1981.]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関口安義：『「羅生門」を読む』。東京：三省堂，1993年。

[Sekiguchi, Yasuyoshi. *Reading "Rashomon"*. Tokyo: Sanseido, 1993.]

田中実：「『羅生門』の＜読み＞の革命——＜近代小説＞の真髄を求めて」、『日本文学』1 (2018)：6-7。

[Tanaka, Minoru. "The Revolution of Reading 'Rashōmon': Seeking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Novel." *Japanese Literature* 1 (2018): 6-7.]

新渡戸稲造：『武士道』。東京：岩波書店，1938年。

[Nitobe Inazo. *Bushido*. Tokyo: Iwanami Shoten, 1938.]

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論』。東京：有精社，1971年。

[Yosida, Seiichi. *On Ryunosuke Akutagawa*. Tokyo: Yuseisha, 1971.]